

私典化公藏：許紹南藏書捐贈對 新加坡漢學學術生態的構建

From Private Collection to Academic Resource: Koh Siow Nam's Book Donation
and Its Impact on Shaping Singapore's Chinese Studies Landscape

沈俊平 (Sim Chuin Peng) *

一、引言：從私藏寶庫到學術公藏—— 許紹南藏書與新加坡漢學基石

在當代全球化與多元文化日益交融的學術環境中，私人藏書轉化為公共收藏，不僅體現知識的代際傳承，更延續文化記憶與學術精神的血脈。許紹南（1911-1963）作為二十世紀華人社會的重要知識分子與著名藏書家，數十年如一日，潛心收集自辛亥革命後、五四運動與民國時期的文學、哲學及學術刊物，以至明清時期的稀見古籍，悉心構築出一座龐大而系統的文化寶庫。此批藏書內容極為豐厚，蘊含深厚的歷史價值與獨特的學術意義，成為研究中國傳統與現代思想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

許紹南的私人藏書總計逾七千冊。1963年11月16日，他於彌留之際決定將其全部捐贈予新加坡大學圖書館（今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的前身），以惠後學。此一捐贈，標誌著這批珍稀私人文獻由「私藏」邁向「公藏」，實現文化資源的共用與知識的公共化。此舉不僅大幅充實新加坡大學圖書館的漢學館藏，亦為新加坡乃至東南亞地區的漢學研究提供堅實而豐富的資源保障。隨著新加坡逐漸成為區域學術交流的重要平臺，許紹南

藏書的加入無疑為本地漢學學術生態注入新的活力與可能。

這批藏書內容廣泛，生動呈現中西文化交匯與時代精神的獨特印記。許紹南的捐贈不僅承載個人的文化理想與家國情懷，更為新加坡漢學界搭建起一座溝通歷史與現實、聯結地方與全球的橋樑。本文將初步梳理許紹南藏書的學術價值與文化內涵，分析其捐贈如何促進新加坡漢學學術生態的形成與發展，最後以「紙本遺產與未來」作結。

二、人生歷程與文化理想：許紹南的 學術追求與文人扶助

許紹南1911年生於廣東省潮安縣宏安鄉，正值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劇烈轉型的關鍵時期。1927年，少年許紹南自廣東省立金山中學畢業後，踏上南下新加坡的旅途，開啟了兼具文化情懷與實業智慧的多元人生。

初到新加坡，許紹南以經商為業，代理三星白蘭地、阿華田、白蘭氏雞精，批發紅舌狗烏蜜酒（健力士黑啤 Guinness 的俗稱）等洋貨，始終秉持薄利多銷的經營理念，追求誠信與穩健。其店鋪是位於牛車水珠烈街

* 作者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Chulia Street) 37-39 號的「振華興」商號。店鋪外觀樸素低調，僅為普通門面，樓上則堆滿存貨，旁邊的小辦公室內擺放著他偏愛的功夫茶具和算盤，營造出溫潤內斂的文化氛圍。許紹南的商業理念不僅關注經濟利益，更深受文人情懷影響，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信義與真誠。即便後期代理權被更具商業頭腦者取代，他也泰然處之，無怨無悔，始終堅信「心中坦蕩，問心無愧，乃人生最大安慰」。¹

然而，許紹南人生的主旋律並不僅限於商賈身分，更是文化守護者與知識傳承者。他對書籍的熱愛近乎執著，視藏書為精神財富和文化使命。儘管身處戰亂頻仍、社會動盪的年代，他依然不忘保護與傳承文化遺產，專注於搜羅、整理和保存各類珍貴書籍。其藏書涵蓋中國古典文獻，清華、北京等高校的珍稀期刊與專著，兼收五四運動以來的新興學術著作。這些藏品在當時兩岸三地乃至海外學界皆屬稀有珍貴，極具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面對戰亂和動盪，他多次設法轉移藏書避免流失，若有遺失則盡力補全，展現出高度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許紹南藏書的文化影響遠及家庭與社區。著名作家蔡瀾（1941-2025），蔡文玄（1906-1995）之子，²至今仍深情回憶童年時期每個令人期待的星期天。每逢周日，家人會衣著整潔，從位於大世界遊樂場的住所搭乘德士，一同前往林大頭路 28 號拜訪許紹南。蔡瀾親切地稱他為「阿叔」。許紹南雖與蔡家並無血緣，卻親如一家。他家是一幢典型的東南亞高腳屋，院落寬敞，屋前帶頂廊道，擺放石桌石凳。許紹南總是笑容可掬，有略微肥矮的身材，永不穿外衣，只是一件三個珍珠鈕扣

的圓領薄汗衫和一條絲制的白色唐褲，腰間圍著黑皮帶附錢夾。頭髮比陸軍裝還要長些，一張圓臉留著細髭。³

許紹南尤為鍾情五四運動後的中國新文學的藏書。「所藏幾萬冊均為原裝第一版本，兼有北京、清華等大學的學報、刊物和各類雜誌。五四時期後出版的應有盡有，不少還是作家親筆簽贈。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三種漫畫月刊也都收集齊全。有些資料，我（蔡瀾）相信兩岸都未必那麼齊全。」隨著年歲增長，蔡瀾「學姐姐躲在書房裡，談冰心、張天翼和趙樹理。病中，捧著《西遊記》《三國》《水滸》等古典小說，沉醉書香之間。」隨著閱讀量增加，蔡瀾興趣也逐漸拓展到譯著，如《伊索寓言》、希臘神話、狄更斯《大衛科波菲爾》、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等。許紹南書架上雖明明寫著「書不外借」，卻總是大方讓孩子們借閱，只叮囑按時歸還。孩子們也自覺，「儘量在第二個禮拜奉還，要是隔兩個星期還沒看完，便裝病不敢到阿叔家裡去」。⁴

許紹南以精通中國文學著稱。1927 年來新加坡經商後，他不斷擴展自己的文學涵養，並堅信文學應與時俱進，因此持續訂購中國大學出版的現代文史刊物。據其在 1929 年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周作人（1885-1967）《過去的生命》上的手記記載，此書為他於 1930 年 1 月 21 日購得。部分藏書則為友人饋贈，如 1944 年上海太平書局出版的周作人《苦口甘口》，是他於 1950 年 7 月 28 日由蘇乾英郵寄贈送所得。二戰前，許紹南的藏書已逾兩萬冊。對日抗戰時期（1937-1945），他擔心藏書受毀，遂將其運往中國避難。可惜戰後運回時損失近半，使他深感遺憾。為重建藏書，他曾高價從北京琉璃廠等地購入善本，如 1945 年再版的周作人《藥堂雜文》，據

1 蔡瀾〈阿叔〉（下），《聯合早報》1984.07.14，46 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lhzb19840714-1.2.85.3.1>（2025.6.25 上網檢索）。

2 蔡文玄（1904-1995），筆名柳北岸、石門，為新加坡華文詩人、教育家、編輯與電影工作者，1927 年南來新加坡。曾任馬來亞笨珍大同學校校長，亦曾短赴上海從事教育。以「石門」名主編《正報》文藝副刊《活地》。1936 年以柳北岸之名出任新加坡邵氏兄弟公司中文部經理，並擔任《新詩月報》與《新野》文藝雜誌編委。其創作以詩歌見長，著有《十二城之旅》、《無名的虹》、《雪泥》、《旅心》等詩集。對新華文學貢獻良多；1970 年新加坡作家協會成立時當選主席團成員，後任第二屆主席，繼而為會務顧問。1982 年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成立時受邀出任顧問。1995 年卒於新加坡。

3 蔡瀾，〈阿叔〉（上），《聯合早報》1984.07.12，47 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lhzb19840712-1.2.91.7.1>（2025.6.25 上網檢索）。

4 同上註。

其手記記載，為他於1946年8月12日自琉璃廠來熏閣郵購所得；1957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宋）秦觀著、龍榆生校點的《淮海居士長短句》，則為他於同年11月20日在新加坡購得。許紹南亦專注收集戰時中國的重要出版物。雖未能完全恢復舊藏，但其館藏之豐富，在新加坡堪稱一絕。

許紹南的藏書絕非為炫耀所用，而是源自對學問的真摯熱愛。每當傍晚，他從位於牛車水珠烈街「振華興」商號返家，洗漱用膳後，便步入名為「霜月蟲聲齋」的靜謐書房，沉浸於浩瀚書海之中。每每手不釋卷，常常讀至深夜，流連忘返。⁵他亦酷愛校對工作，細緻入微。譬如1953年4月18日，他購得一本未署出版年月、由香港北新書局印行的周作人《藥堂集文》，從書賈口中得知該書實為香港翻印本。許紹南於是將此本與原刊細加校對，發現「盜印本錯字甚多，當據原印本勘正」，並據實指出其中訛誤，力求典籍之準確無訛。

1960年至1963年間，曹樹銘任教前南洋大學中文系，通過陳宗瑞（1910-1985）介紹結識許紹南。⁶每次路經「振華興」，曹氏必入內與許紹南暢談文史，彼此相知甚深。夜間常赴許宅觀藏書，搜集資料，評書論文，盡興而歸。許紹南每次必焚香沏茶招待，談興正濃時，屢至深夜不倦。許紹南對中國文學百年演變有著清晰而深刻的理解，令曹樹銘深為折服，稱其為新加坡文化界耆宿。許氏記憶驚人，尤對近幾十年中國歷史變遷與時代背景洞若觀火，娓娓道來，如數家珍。皆因平日博覽

群書，學識淵博，修養深厚，方有此造詣。許紹南尤鍾情於《孽海花》，立志搜集書中人物相關資料並撰文研究，惜未竟全功。他亦鑽研詞曲與戲劇，尤推崇任中敏（1900-1963）、龍榆生（1902-1966）兩位詞學大家，並與海外學人書信交流，吟詩酬唱，成果頗豐。⁷

除曹樹銘外，「過去本坡學人如韓槐准諸先生，於學問有疑難時，亦常向彼請教，可見先生學問指淵博。」⁸

晚年病榻之時，他最掛念的依然是書籍的歸屬。看到「那幾個見到印刷品就掉頭走的兒女」，他頗為不安地向蔡文玄提出同樣的問題：「那些書呢？」於是他將心願託付給蔡文玄，蔡文玄寬慰道：「捐給大學生的圖書館吧！」許紹南聞言釋然，微笑安然辭世，逝於1963年11月16日，⁹享年53歲。¹⁰

除酷愛藏書與閱讀外，許紹南亦懷扶掖文士之心，不時接濟中國大陸文人。其所藏《苦茶庵書簡》收錄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周作人（1885-1967）親筆信二十通，由許紹南悉心保存，並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捐贈新加坡大學圖書館。雖非專致許氏之書簡，然多有涉及，尤以贈書與手笺交換之細節最為顯著，足見周氏對許紹南的高度評價。信中稱許氏索求墨寶與圖書，非為私賞，實出文化支持與南洋文脈建設之誠意。

這類以贈書、題字為媒介的互動，構成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海外華人與中國文人之間獨特而溫暖的文化援助網路。許紹南作為南洋華僑，不僅以實際行動支持文人生活，更以文化熱忱搭建起商人與知識分子間的深厚情

- 5 曹樹銘，〈許紹南先生〉（上），《南洋商報》1963.11.25，17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31125-1.2.36.6.1>（2025.6.28上網檢索）。
- 6 關於曹樹銘的簡介，可參周維介，〈大時代的特徵 背景不一般的南洋大學中文系學人〉，《聯合早報》，2021.08.02，<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history-heritage/story20210802-1176742>（2025.7.25上網檢索）。
- 7 同註5；曹樹銘〈悼許紹南先生〉（下），《南洋商報》，1963.11.26，17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31126-1.2.38.3>（2025.6.28上網檢索）。
- 8 〈新大將隆重舉行許紹南贈書典禮〉，《南洋商報》1966.10.14，18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61014-1.2.32.21>（2025.7.28上網檢索）。韓槐準（1891-1970），字位三，別署「愚趣齋生」，海南文昌人。1915年赴南洋謀生，先為人傭工，繼而自辦果園創業；其間漸對中國古陶瓷研究產生濃厚興趣。1962年返中國大陸後，受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故宮博物院顧問，並數度將多年所藏文物捐贈故宮。著有《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
- 9 〈中國文史目錄學專家許紹南先生逝世 遺書達數萬卷將增星大〉，《星洲日報》，1963.11.17，14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631117-1.2.50.3>（2025.6.25上網檢索）。
- 10 蔡瀾〈阿叔〉（下），《聯合早報》1984.07.14，46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lhzb19840714-1.2.85.3.1>（2025.6.25上網檢索）。

誼。蔡瀾在〈阿叔〉一文中，便以童年回憶生動記錄許紹南對周作人的資助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傾心收藏。

由陽臺進主宅的門楣上，掛著一副橫匾，寫了幾個毛筆字，簽名並蓋印。

第一次到阿叔家時拉爸爸袖子，問道：「寫些什麼？」

爸爸答：「這是周作人先生寫給阿叔的，是他這個家的名字。」

「家也有名字嗎？周作人是誰？」我還是不明白。

「你以後多看書，就知道他是誰了。」

爸爸很耐心地說：「也許，有一天，你會學他寫東西也說不定。」

「但是，」我不甘休，「為什麼這個周作人要寫字給阿叔？」

「阿叔是個做生意的商人，但是很喜歡看書，而且專門收集五四運動以後的書……」

「五四運動？」我問。

爸爸不理我，繼續說：「中國文人多數沒有錢。阿叔時常寄錢給他們，為感謝阿叔，就寫些字相送。」

「文人很窮，什麼學他們寫東西？」我更糊塗了。¹¹

這段樸素的對話，道出了關鍵事實：阿叔雖為商人，卻熱愛書籍，樂於資助五四以後中國文人的創作，並通過收藏字畫、購書捐資等方式，默默為現代文學發展提供支援。這種援助超越了金錢，成為文化價值與人文精神的真實體現。許紹南不僅是藏書家，更是中國近現代文化傳承鏈的重要一環。他的資助與互動，為文人創作帶來現實依託，也在海外華人與中國文人之間，搭建起一座跨越地域、貫通情感的文化橋樑。

許紹南對周作人的資助，在其友人龍榆生（1902-1966）的詩詞中亦有深刻體現。1953年，龍榆生作〈癸巳暮春寄懷許紹南新嘉坡〉七絕二首，抒寫對許氏的思念與敬意：

其一

宗邦文物有輝光，魂夢牽縈萬里長。

何日花前同把酒，炎方且遣變清涼。

其二

落花時節在江南，中散心知七不堪。

憶得旌陽相厚意，啣濡長並苦茶庵。¹²

這首詩贊許紹南延續宗邦文物輝光，雖相隔萬里，情誼常在，盼有朝一日共聚暢飲。次詩借江南落花寄託離愁，稱許紹南為「旌陽」，寓其風雅與德行，以「啣濡長並苦茶庵」點出許氏對周作人的長期資助。龍榆生詩中情誼深摯，也為許紹南文化人格的真實寫照。

同年，龍榆生又作〈口占報許紹南〉一詩：「一兩成秋涼意深，藥爐經卷夜沉沉。百朋再錫妻眉展，沒齒難忘啣沫心。」¹³詩中「藥爐經卷」契合周作人信中所述龍榆生因病療養的處境，透露其時生活艱難。許紹南恰在此時以購藏書畫援手，可以說是真正的知己。詩句「沒齒難忘啣沫心」，更深情表達對許紹南長久關懷的銘感不忘。其後，龍榆生更有多篇作品寄許紹南，如〈自題《秋江憶遠圖》寄許紹南〉、〈望江南·漫寫梅枝寄許紹南〉等，借江南景物和梅枝清韻，遙寄知音。詩詞中稱許紹南為「賞音人」，贊其高雅品味與知人之明，展現超越地域、歷久彌堅的文人友情。¹⁴

綜上，許紹南不僅是支援周作人、龍榆生等文人的南洋僑商，更是一位具文化抱負的「賞音者」。他在南洋華人知識網路與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化脈絡之間，建立起一條低調而深遠的精神紐帶，體現出商人與文人以書

11 蔡瀾，〈阿叔〉（上），《聯合早報》1984.07.12，47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lhzb19840712-1.2.91.7.1>（2025.6.25上網檢索）。

12 龍榆生著，《忍寒詩詞歌詞集》，張暉主編，《龍榆生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182。轉引自高斌，〈苦茶庵書簡二十封輯錄與研究〉，《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1（2023）：71。

13 同上註。

14 高斌，〈苦茶庵書簡二十封輯錄與研究〉，頁71。

為媒、以心相通的文化共鳴。許紹南「在星逝世之後，聞中國之友人如北京之周作人、上海之龍沐勛，蘇乾英以及任二北等教授，均感痛失此位學人，並曾為聞哀悼」。¹⁵ 足見許紹南之文化襟懷與知音之義，已超越一般僑商的物質資助，轉化為可持續的公共文化實踐。

三、從接洽到典藏：許紹南藏書捐贈歷程與精神傳承與精神傳承

許紹南畢生致力於藏書，三十餘年訪遍海內外書肆，廣收珍稀典籍。其藏書規模宏大、門類繁富：既有中國傳統經典，亦收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以來出版的學術期刊、現代哲學著作、宗教文獻及各類新型出版物。其中多種為海外罕見，甚至孤本，整體構築出一座豐贍的中文與漢學研究寶庫。前述所及，1963年11月16日，他於病榻之上依友人蔡文玄之建議，無償將其藏書捐贈新加坡大學圖書館。其逝世翌日，報章即報導了此項捐贈。¹⁶

1963年11月22日，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主任賀光中及其夫人賀蔣振玉（時任大學中文圖書館館長），在信託人蔡文玄（時任邵氏公司中文部主任）與余順孝（Ee Soon Howe，新加坡大學最高理事會理事、英國溫達有限公司遠東區經理）的協助和見證下，親赴許紹南的寓所，實地考察其珍藏多年的私人藏書。¹⁷

這次會面不僅成為館藏捐贈的重要轉捩點，更是學術界與文化收藏界深度融合的歷史性時刻。賀氏夫婦高

度敬佩許紹南先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搜求、鑒藏、整理藏書的精神。他們認為，這批藏書數量巨大、保存完好、內容豐富，在版本學與目錄學上價值極高，對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的教學與研究將帶來深遠影響，特別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術訓練與文獻素養。

賀氏夫婦稱這些遺書為無價之寶，藏書囊括罕見古籍、近現代期刊和學術專著，同時也承載了中國文壇及思想界關鍵歷史節點和文化運動的珍貴文獻。在當時的新加坡乃至整個東南亞學術界，這一藏品具有極為稀有的收藏價值和文化意義。為充分發揮藏書的學術價值，賀氏夫婦建議儘快啟動系統的編目和整理工作。計畫由中文圖書館專業團隊先行進行初步整理、編排與列目，形成正式的書目目錄，隨後由信託人與新加坡大學校方協商捐贈事宜，確保這些珍貴藏書能順利且妥善地納入新大圖書館，長期服務於學術界。¹⁸

同年，報章引述蔡文玄長子蔡丹稱，這批藏書市值超過十萬新元，但鑒於其中珍品罕見且歷史價值極高，其實際價值遠超市面估價。¹⁹

1966年10月17日下午四時，新加坡大學圖書館舉行簡短而莊重的「許紹南先生藏書贈送典禮」。儀式上，許紹南三子許益明將七千餘冊藏書鄭重移交給新加坡大學代理副校長雷金納德（Reginald Quirk）。贈書儀式中，許益明與柯雷納德分別致辭。出席者除許氏三子、新大代理副校長與圖書館主任外，還包括許氏其他子嗣、新大中文系主任林徐典、及許氏生前摯友蔡文玄等數十人。²⁰

15 〈新大將隆重舉行許紹南贈書典禮〉，《南洋商報》1966.10.14，18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61014-1.2.32.21>（2025.7.28 上網檢索）。

16 〈中國文史目錄學專家 許紹南先生逝世 遺書達數萬卷將增星大〉，《星洲日報》，1963.11.17，14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631117-1.2.50.3>（2025.6.25 上網檢索）。

17 〈賀光中伉儷昨日連袂前往許紹南寓所參觀贈新大遺書對許氏贈書精神表敬佩〉，《南洋商報》，1963.11.23,12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31123-1.2.34.5>（2025.6.25 上網檢索）。

18 同上註。

19 “Before death—a gift”，*The Straits Times*, 1963.11.17, p2.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631117-1.2.18>（2025.8.15 上網檢索）。

20 〈已故許紹南藏書贈送新大圖書館昨日舉行一項簡短儀式由許氏令三郎益明移交〉，《南洋商報》，1966.10.18，17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61018-1.2.30.12>（2025.7.16 上網檢索）。

在儀式上也發布了蔣振玉特別編纂了一份長達 138 頁的《許紹南先生贈書目錄》，詳細列明藏書門類，包括經學、哲學、宗教、歷史科學、社會科學、語言文學、美術遊藝、自然科學、農業工藝等，既有古代的，也有近現代的，其中一些更為珍本。²¹ 該目錄為後續館藏整理與學術利用提供了重要參考，也成為新加坡大學中文圖書館的重要文獻資料。

四、館藏精粹與學術價值：許紹南藏書的學術與文化貢獻

許紹南藏書是一批極為珍貴的館藏，共計七千餘冊，涵蓋五千多種不同書目。其內容廣泛，既有中國古代經典，也包括現代文學與哲學著作，涉及歷史、文化、宗教、藝術等多個領域，充分展現中文與漢學遺產的豐富內涵，亦體現了藏書者深厚的文化素養與獨特的收藏眼光。此批藏書是繼賀光中於 1953、1954 年兩度前往香港、日本採購珍本，耗資叻幣二十五萬、購入十三萬冊中文書籍之後，²² 館內所獲的第二大批重要藏書；也是新加坡大學中文圖書館自 1953 年隨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設立以來最為重要的單項捐贈。該批藏書不僅極大充實了中文圖書館的古籍線裝館藏，亦以大量近現代文學與學術期刊為館藏增添了新的亮點。

在古籍部分，許紹南藏書尤以明清兩朝稀有版本著稱，其中不乏珍貴刻本，如：

- 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刻本《明狀元圖考》三卷，附《明三及第會元詩文》二卷
- 明萬曆間金陵富春堂刻本《新刻出相音注勸善目連救母行孝戲文》三卷一百一折
- 明崇禎間刻本《山水鄰新鐫花筵賺》二卷
- 明崇禎四年（1631）人瑞堂刻本《新鐫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豔史》八卷四十回
-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揚州詩局重刻本《都城紀勝》
- 清初古吳致和堂刻本《新刻出像點板時尚昆腔雜曲醉

怡情》

- 清乾隆四年（1739）刻本《鈍吟老人雜錄》十卷

這些藏書多為許紹南在新加坡經商有成後，憑藉卓越鑒賞力和深厚文化情懷，從中國及海外著名藏書家處精心購得。其中不少藏品帶有王建元、蔡聲亞、丁彥、瞿玄英、沈君強等知名藏書家的收藏印記，顯示流傳有序，書源清晰，多為私人珍藏的孤本或稀見版本，極具文獻價值和歷史意義。²³ 通過這些藏書，可清晰勾勒出清末至民國時期民間藏書流轉的路徑，以及海外華僑對中國文化遺產的積極承載與延續。

許紹南所藏之書，皆鈐有「許紹南印」及「霜月蟲音齋藏書」印章，不僅彰顯藏書主人的文化身分，更成為辨識文獻來源的重要標誌。部分藏書還附有許紹南親筆手記，詳細記錄購藏的年月日、購自何處或受贈經過，並常署以簡要的姓名縮寫。許紹南以商人的魄力廣泛搜羅典籍，更以士人的情懷珍視書香世業，使這些珍貴文獻得以妥善保存，最終捐贈予新加坡大學圖書館，嘉惠後世學者。這批藏書現已系統整理，並全部收錄於中華書局 2021 年出版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成為海內外研究中國古籍流傳與交流的重要基礎資料。

許紹南藏書的珍貴，不僅在於數量的宏富與保存的完整，更在於其承載的深厚文化積澱和鮮明時代精神。這些藏品不僅是靜態的紙本文獻，更是百年來中國思想、文化與學術變遷的鮮活縮影。尤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一世紀初數位化尚未普及、學術文獻獲取管道有限的背景下，許紹南所收藏的紙本期刊與學術刊物，成為新加坡乃至整個東南亞地區漢學研究的重要文獻資源。

這些紙本期刊與學術刊物，涵蓋自 1911 年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各國立和私立高校、文化社團與思想團體的重要出版物，完整記錄了近現代中國文化思潮的激蕩、學術體系的建立與思想路徑的嬗變。它們不僅見證五四新文化運動、左翼文藝思潮、民族主義浪潮與社會

21 蔣振玉編，《許紹南先生贈書目錄》（新加坡：新加坡大學，1966）。

22 邱克威，〈馬來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及其鈐印探析〉，《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2（2020.9）：11-15。

23 詳參沈俊平，高斌編，《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北京：中華書局，2021）。

改造運動等重大歷史進程，更在許多現已難以尋覓的珍稀刊物中，保存了當時學者、作家、學生與思想先鋒的原初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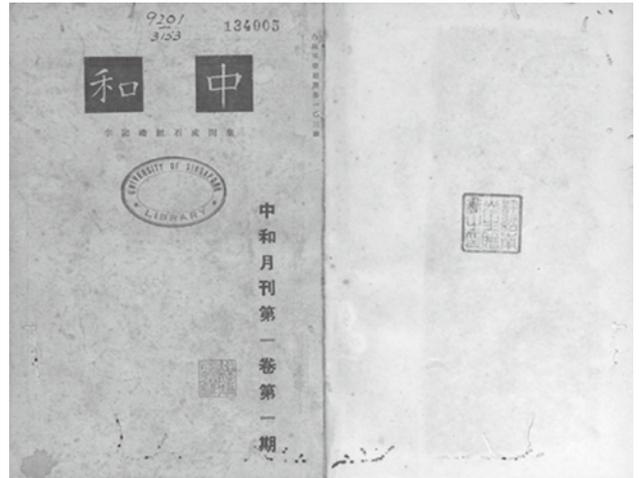
許氏藏書尤以民國以後中國各高校及文藝社團所出版的期刊雜誌為最大特色，幾乎囊括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主要學府和文化團體的重要出版物。如《創造季刊》、《新青年》、《創造月刊》、《會友週報》、《狂飆》、《晨報》、《古今》、《清明月刊》、《宇宙》、《六藝》、《黎明》、《活時代》、《青年界》、《十日談》、《現代學生》、《華年週刊》、《鞭策週刊》、《不忍雜誌》、《貢獻旬刊》、《群雄月刊》、《求是月刊》、《子曰叢刊》、《獨立評論》、《申報月刊》、《國風半月刊》、《新中華雜誌》等。這些期刊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思潮和學術辯論，更為新文化運動、青年運動、社會轉型與現代中國意識形態流變的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與此同時，許紹南的藏書體系中還包含數量可觀的高校學術期刊，如《漢學》、《學原》、《學林》、《學術》、《漢學論叢》、《學海月刊》、《學文雜誌》、《清華學報》、《清華週刊》、《國學季刊》、《國學月報》、《金陵學報》、《燕京學報》、《文哲季刊》、《嶺南學報》、《師大月刊》、《北京大學月刊》、《暨南學報》、《輔仁學志》、《齊魯學報》等，全面反映了民國學術界的研究水準和精神風貌。其所涉學科領域涵蓋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語言學、藝術、社會學等，對於深入理解民國學術結構、學者網路及學科發展脈絡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前北京著名舊書店來熏閣，曾收買上述大學學報，每本價為人民幣五百元，可見上述藏書之珍貴。」²⁴

新加坡大學圖書館館長珍·M·沃勒（Jean M. Waller）在《許紹南先生贈書目錄》的前言中指出，《中和》月刊（1940年創刊號至1945年第6卷第4期）和《同聲》月刊（1941年創刊號至1945年第4期）最為珍稀。²⁵

《中和月刊》創刊於1940年1月，終刊於1944年

12月，共60期（合刊計58冊），是抗戰時期極具影響力的人文社科學刊。其宗旨為「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眾信念」，內容涵蓋圖畫、史地、傳記、語文、金石、藝術、社會、掌故、題跋、書評、專論、筭記、文藝、時事、通信等十五大門類。主要作者有周作人、瞿兌之（1895-1974）、黃賓虹（1865-1955）、徐一士（1890-1971）、謝國楨（1901-1982）、傅增湘（1872-1949）、孫海波（1909-1972）、謝興堯（1906-？）、孫作雲（1912-1978）、俞陸雲（1868-1950）、錢稻孫（1887-1962）等，均為文學、歷史、藝術、考古、民俗等領域的知名學者。刊物發表了大量學術論文、歷史掌故、文藝評論，以及中日文化交流、鴉片戰爭、庚子事變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資料。以「鑒往知來」為目標，注重歷史回顧與資料整理，也宣導面向未來的思考，積極推動中日文化交流。其內容豐富、學術規範，為抗戰時期保存和傳承中國與東亞文化、激發民族信念、促進學術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是研究近現代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珍貴文獻。²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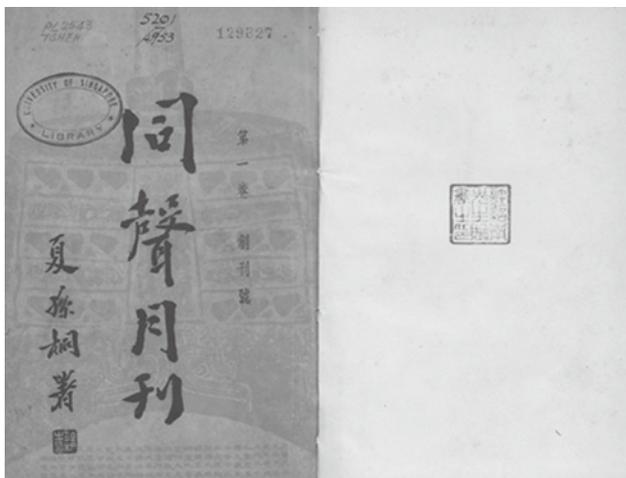
《同聲月刊》由著名詞學家龍榆生於1940年在南京創辦，至1945年7月停刊，共四卷三十九期。作者群體龐大，囊括俞陸雲（1868-1950）、夏敬觀（1886-

24 〈新大將隆重舉行許紹南贈書典禮〉，《南洋商報》1966.10.14，18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61014-1.2.32.21>（2025.7.28上網檢索）。

25 Jean M. Waller, "Preface", 載於蔣振玉編，《許紹南先生贈書目錄》。

26 于靜，〈林辰藏淪陷區期刊——《中和》月刊〉，《魯迅研究月刊》5（2007）：70-75。

1947)、趙尊嶽(1898-1983)、陳能群(生卒年未詳)、冒廣生(1863-1944)、王蘊章(1894-1976)、錢仲聯(1908-2003)等百餘位活躍詞學家。內容涉及詞樂、詞律、詞韻、詞史、詞人、詞派、詞籍、詞論、詞選等多個領域,刊載趙尊岳《金荃玉屑》、吳眉孫(1887-1957)《四聲說》、《清空質實說》、冒廣生《新輯雲謠雜曲子》、俞陸雲《唐五代兩宋词選釋》等代表性論文。該刊陸續刊載了百餘位作家的數千篇詩詞原創作品,極大豐富了近現代詩詞創作資料,對搜集、整理和研究近現代詞學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是二十世紀中國詞學發展與研究的重要文獻。²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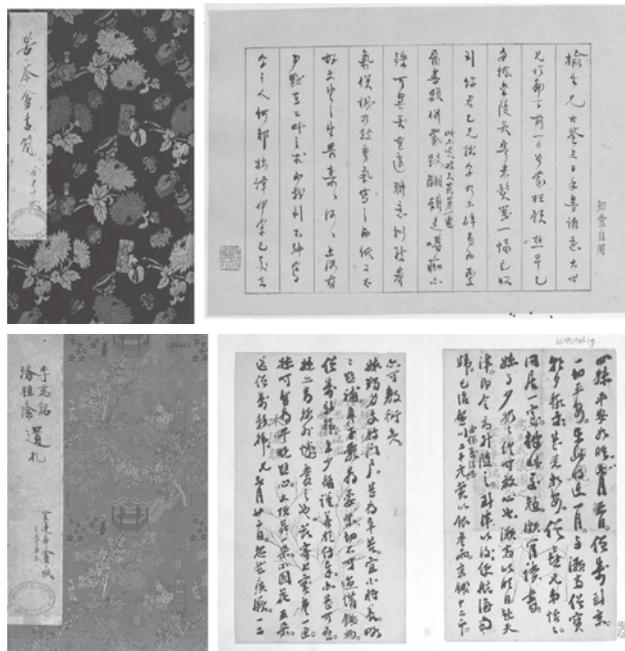


此外,許紹南所保存並捐贈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的《苦茶庵書簡》極為珍貴,收錄了周作人(1885-1967)1950至1953年間寫給蘇乾英(1910-1996)、龍榆生的親筆書信二十封,內容涵蓋生活、創作及與南洋華人的交流,既展現了中國知識分子與東南亞華人社會的緊密聯繫,也為研究周作人文學思想提供了難得的原始資料。許紹南還將周作人贈送的《李慈銘潘祖蔭遺笥》及近四十種周作人著作一併捐贈,極大豐富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的中國現代文學館藏。²⁸

在當時,新加坡與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日本等學術出版重鎮之間尚未形成便利的文獻流通體系。許紹南通過數十年持續購藏,不僅主動搭建了跨地域的紙本

文獻匯集通道,也為新加坡大學圖書館彌補了近現代思想與學術出版物方面的結構性缺口。其藏書為新加坡大學及後來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提供了涵蓋傳統和現代、文史與社科兼備的完整學術基礎,為東南亞漢學研究的在地化、生根與延展發展構築了可靠的文獻底座。

更重要的是,這批紙本期刊與學術刊物幾乎橫跨二十世紀所有關鍵歷史節點,成為後來漢學界、歷史學界、文學界研究民國思想史、社會運動史、文化轉型史的重要文獻支撐。即便在現今高度數位化的學術環境下,這些原始紙本的历史價值與學術分量仍不可替代,其館藏意義遠超物理文獻,成為連接中國近現代歷史與東南亞學術場域的重要橋樑。儘管部分內容現已可通過資料庫獲取,但紙本文獻所保留的历史肌理—包括排版風格、材質、批註與裝幀等,卻是數字資源難以複製的文化厚度。那些印刷在舊紙上的思想與語言,仿佛凝聚著一個時代的溫度,也持續激勵後人深入探索中國近現代歷史與文化的深層結構。



因此,許紹南藏書不僅是文獻的收集,更是文化精神的守護與再生。它不僅是知識分子對民族文化命運的

27 南江濤,〈《同聲月刊》的價值管窺——以趙熙詩為例〉,《泰山學院學報》38.5(2016):56-61。

28 高斌,〈苦茶庵書簡二十封輯錄與研究〉,頁62-72。

深切回應，也是一個家族以藏書見證時代的獨特印記。隨著捐贈的完成，在公共空間中持續發揮著深遠的精神遺產影響。可以說，許紹南不僅是一位卓越的私人藏書家，更是無意間塑造新加坡漢學基礎文獻版圖的重要奠基者。

五、學術生態的奠基與轉型：許紹南藏書對新加坡漢學的深遠影響

自 1953 年馬來亞大學（1962 年，馬來亞大學新加坡校區改制為自治大學，定名為新加坡大學）中文圖書館成立以來，許紹南藏書成為繼 1950 年代初賀光中赴香港、日本採購藏書後的首宗大型無償藏書捐贈。這批藏書品質卓越，極大地豐富並提升了館藏的學術價值，是新加坡大學中文圖書館建設中的重要里程碑。許紹南捐贈的大量期刊和圖書，不僅極大充實了新加坡大學圖書館的館藏結構，也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館內在近現代中國思想與學術出版物方面的歷史性空白。

1953 年，馬來亞大學設立中文系。該校中文圖書館一直致力於系統化的古籍收藏。時任中文系主任的賀光中曾親赴香港、日本大規模採購中文圖書，總數高達十三萬冊，以經史子集線裝古籍為主。這批藏書在規模與版本價值上堪稱東南亞翹楚，甚至被錢穆譽為「東南亞中文圖書館之最」，但其主要側重於古代經典，對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現代學術、社會運動及思想刊物的系統收藏尚有不足。²⁹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許紹南捐贈的期刊與現代中文圖書，具有重要的戰略補充意義。他所收藏的大量民國以來高校出版物、新文化運動期刊、現代思想社團雜誌等，恰好彌補了圖書館在現代文獻上的不足，使館藏從「古籍為主」逐步拓展為兼收並蓄、古今貫通的綜合體系。許紹南的藏書，使新加坡大學圖書館不僅在古典文獻領域佔有重要地位，更成為研究二十世紀中國近現代

學術發展和文化變遷的堅實基礎，極大提升了學術資源水準和研究能力。

許紹南藏書不僅是一批書籍與期刊的簡單集合，更是跨越歷史時空的文化橋樑，連接著幾代人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和學術精神的傳承。他以獨特的眼光和深厚的文化積澱，收藏了大量罕見文獻，涵蓋明清至近現代的多樣文化載體，展現出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學術價值。蔡瀾回憶，兒時每逢周日造訪許叔叔家，深受藏書氛圍吸引，這些體驗成為其文化素養的重要源頭。曹樹銘多次與許紹南深入交流，探討中國文學數十年變遷與風貌，彰顯了許紹南不僅是藏書家，更是社區文化導師和知識傳播者，對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將這批珍貴藏書慷慨捐贈新加坡大學圖書館，是許紹南富有遠見的文化保護行動。這一舉措保證了珍稀文獻能夠科學保存、系統整理，得以長久傳承和廣泛傳播。藏書內容涵蓋明清時期的文學瑰寶、珍稀版本和手稿，以及二十世紀初的重要學術期刊和報刊，生動而全面地呈現了中國近現代學術精神與文化脈絡。許紹南通過捐贈，使其文化遺產得以延續，激發學界和公眾持續探索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推動文化認知和學術研究不斷進步。

許紹南豐富的藏書內容為中文學科的深度發展和多維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資源，助力學者開展跨學科、跨區域學術交流與合作。許多研究者通過這些文獻深入探討中國文化、文學、歷史及社會變遷的多個層面，極大推動了漢學研究的繁榮。文化界人士蔡丹高度評價許紹南，指出「雖商界頗有成就，但對中華文化熱愛投入尤深」。³⁰ 他的藏書不僅反映個人學術情懷和文化使命，更成為新加坡乃至東南亞中文學術研究的瑰寶，為地方文化建設和學術傳承注入了持久活力。

1963 年冬，許紹南辭世，龍榆生悲痛萬分，作七律一首以表哀悼：

29 錢穆，〈我來馬大中文系講學後之感想〉，《南洋商報》1956.06.10,6 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60610-1.2.30.12> (2025.7.11 上網檢索)。

30 “Before death—a gift”，The Straits Times, 1963.11.17, p2.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631117-1.2.18> (2025.8.15 上網檢索)。

汝南月旦共誰評，顧視瀛寰世屢更。
 曾荷聞聲勞夢去，慳同把盞慶河清。
 留心宗國珍圖史，遺澤遐方識姓名。
 聞道旌陽忽沖舉，臨風一慟愴餘情。³¹

這首詩以「汝南月旦」許劭的典故為引，表達了對歷史人物與其事蹟的緬懷與敬仰。詩中「汝南月旦共誰評」暗示知音難得，強調交情深厚。末聯「遺澤遐方識姓名」寓意深遠，體現了許紹南通過捐贈珍貴藏書所留下的持久文化影響與深厚社會恩澤。「遺澤」指其文化財富和知識傳承，造福學界與後人；「遐方」強調這種影響遠播他鄉，歷久不衰；「識姓名」則表達後人因其貢獻而銘記其名，彰顯其在文化傳承中的重要地位。全詩高度概括了許紹南捐贈帶來的廣泛社會和歷史價值，表明他的善行不僅豐富了圖書館館藏，更在文化傳播與知識積累上產生了跨越時間與地域的深遠影響。

六、結語：紙本遺產與新加坡漢學學術生態的未來

許紹南畢生積累的這批珍稀藏書，縱然數量不算龐大，卻以其卓越品質見稱。藏品橫跨數百年歷史，從明清時期的文學珍本，到二十世紀初激蕩人心的現代學術期刊，系統而全面地展現了中國文化與學術的演進脈絡。通過這些藏書，我們能夠直觀體會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以及時代變遷中的思想交鋒與文化創新。它們不僅凝聚了先賢的智慧與文人墨客的心血，更見證了民族精神的傳承與復興。

尤其值得強調的是，許紹南藏書捐贈對於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一世紀初數位化尚未發達時期新加坡漢學學術生態的構建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在學術資源匱乏、文獻獲取途徑有限的年代，許多珍貴資料尚未電子化，許紹南所捐贈的大量一手紙本文獻為新加坡漢學研究提供了最直接、最基礎的學術支撐。正是憑藉這些原

始館藏，新加坡學界得以系統搜集、整理、研究中國古今學術與文化，推動了本地漢學研究由依賴外部轉向本土積累和自主創新，為新加坡成為區域漢學研究重鎮奠定了堅實根基。

許紹南的慷慨捐贈，早已超越個人收藏的範疇，成為連接過去與未來、東方與世界的重要文化紐帶。藏書的保存與開放，不僅為新加坡大學的中文學科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也為整個東南亞的漢學學術界注入了持久的動力。這些藏書讓研究者能夠在資料尚未數位化的時代，深入探討中國傳統與現代文化的銜接、變遷與發展，推動學術交流、文化理解與知識創新，進一步促進中華文化在多元社會中的傳播與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許紹南藏書的傳承充分體現了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的核心精神。每一本書、每一份刊物都如同一塊文化基石，凝結著幾代學人和文化愛好者的心血與夢想。正是基於藏書為公、知識共用的理念，中華文化才能歷經風雨而不衰，在新加坡學界持續煥發新的生命力。許紹南以實際行動守護文化、惠及後人，展現了強烈的文化責任感與社會使命感。

展望未來，許紹南藏書將持續作為新加坡漢學研究與文化傳承的重要平臺，激勵更多學者與讀者投身中華文化的探索與創新。可以預見，在此一文化寶庫的滋養下，中華文化之光將於新加坡多元社會的交匯中長久綻放，推動本地漢學研究不斷精進，並鼓舞後進持續探索、學習與創新。

綜上所述，許紹南藏書不僅是珍貴的文化遺產，更是新加坡及東南亞華文學術界的精神豐碑。它見證了中華文化的歷久彌新，也為新加坡漢學學者乃至全球華人學者搭建了橋樑，促進了歷史與現代的對話和交流。許紹南的藏書遺產，將持續激勵人們珍視文化、尊重知識、繼往開來，成為新加坡漢學學術生態持續發展的堅實支柱和中華文化不斷前行的重要動力。

31 龍榆生，〈挽許紹南詩二首：聞許紹南先生逝世星加坡賦此弔之〉，《星洲日報》1964.1.23,3版，<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page/scjp19640123-1.1.3> (2025.7.16 上網檢索)。